佛教研究的發展趨勢

木村清孝
日本鶴見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特別顧問
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專題研究計畫總主持人

「佛教研究的現狀與課題」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
2014 年 3 月 28 日，日本：鶴見大學

一、序言：舉辦此次研討會的目的

去年春季，台灣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宣布正式成立。隨之啟動的兩個大型的專題研究計畫之一，就是試圖在佛教史上為「人間佛教」樹立準確定位，闡明其思想史意義的研究專案。此次的兩個專題研究計畫跨越中國、台灣和日本三個地區，分別設有各自的研究據點和團隊，而日本方面的研究主體就設置在鶴見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。本研究所受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的委託，於去年先後簽訂了平等互利的學術交流協議，以及五年專案研究計畫中第一年度的研究合約，揭開了「近現代佛教的開展——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」研究的帷幕。我們的研究團隊，又分為四個小組，分別負責四個子課題的系統性研究。而本次研討會，就是總課題研究計畫啟動的「前奏」，其目的在於為今後各研究小組之間合作和調整的順利展開，設定主旋律。

本次研討會的目的，具體而言，就是要闡明以下幾個問題。那就是，「於當今世界，尤其是亞洲的佛教研究，其現狀如何？今後發展趨勢如何？具體的課題為何？」而今天的主題講演，則是就我近來正在思考的，

宜蘭：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，2015年01月，頁021-030

與上述主題相關的幾個基本的問題點、課題，以及今後的發展方向，闡述幾點看法。

二、 佛教研究的三種型態

(一) 佛道學 (Study of Buddha's Way)

佛道學，就是依據佛教的正規經論和祖師語錄學習佛教。其中不僅包括所謂的「研究」，還要涵蓋嚴格遵循祖師教誨的學習和身體力行的「修行」這兩個方面。日本曹洞宗的開山祖師道元將此稱為「學佛」，言下之意就是「向佛學習」。若從大乘佛教的立場而言，就是要發菩薩之宏願，樹立堅定的信心，並以此為動力，遵循傳統方式，全副身心地專注學習。因此，佛道學的重點自然就落在「願」與「信」兩大基石。

以佛道學為目的的佛教研究，最為典型的就是戒學、定學及慧學的三學。

首先，戒學（增上戒學 sīla-sikkhā）就是要「學習戒律並如法實踐」。在佛教史上，佛陀涅槃滅後經歷數百年，方才制定通常所言的「比丘二百五十戒、比丘尼五百戒」等諸多戒律條目。但是戒律的根本就在於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淫（在家眾則為不邪淫）、不妄語和不飲酒的五戒。至心嚴守奉行五戒，也就成為佛教徒的生活當中，最為根本的規範。

至於「戒」一詞，有時會含糊地涵蓋「戒」和「律」兩個方面，但是嚴格而言，戒和律兩者的概念其實不盡相同。其中，「戒」的宗旨，是向行為主體示範他們可以自發性地起誓和實踐的某種生活軌範。相對地，「律」則是教團所有成員必須遵守的規則與約定，它與普通社會中的法律性質類似，同樣具備強制性和相應的懲罰條例，其中最為嚴厲的

懲罰就是被逐出教團。根本而言，戒學的實踐原理更為側重戒的自律性一面，是要通過自發性的實踐，確立秩序儼然的日常生活和正直誠實的人生態度。

第二，定學（增上心學 adhicitta-sikkhā），就其漢譯的字面含義為「禪定之學」。具體而言，就是瞑想的實踐，其目的在於通過瞑想，達到內心的平和與澄明。

就梵語語源而言，定學中的「定」（adhicitta），其本意為「提昇心理狀態」。因此，定學的原義，並不僅限於瞑想，也涵蓋讀經、寫經等其他各種實踐修行方法。只是作為「提昇心理狀態」的實踐方法，想必要有效維持心靈的統一與專注。或者說，心靈的統一與專注，其實就是達成「提昇心理狀態」目的最為核心的環節。這或許也就是當初將增上心學（adhicitta-sikkhā）漢譯為「定學」時，選擇「定」來對應「adhicitta」的用意所在。綜上所述，所謂「定學」，就是通過瞑想等方式達成內心平和、澄明的實踐方法。

第三，慧學（增上慧學）是「智慧之學」，是培養正確智慧的實踐。佛教經論的鑽研等，都直接隸屬慧學的領域。當然，包括筆者的自身經歷，其實我們從人生的種種歷練中自然獲取的智慧亦不在少數。或許，慧學並非以獲取智慧為目的的刻意行為，而是以瞑想為基礎，在種種效法佛陀的實踐經驗當中，自然而然地具備和形成正確智慧的過程。

另外，三學的漢譯語中皆通附「增上」一詞，是對巴利語或梵語中的接頭辭「adhi-」的意譯，所要表達的含義是「附加乃至增長」或者「進一步提昇」。三學前附加「增上」的要點，就是強調三學中的任何一學，都具備增長和增進的趨勢。

最後，有關上述三學之間的關係，通常的解釋，是說從戒學到定學、再從定學到慧學的循序漸進的過程。也就是說，先修戒而調節正確的生活方式，然後才能進行瞑想的實踐。一旦通過瞑想達到心境澄明的境界，就會產生正確的智慧。

理論上而言，三學的確具備如上所述的階段性過程和趨勢。但是事實上，在實踐過程當中，這樣的階段和趨勢，三學並非一定是按部就班實現的。例如，有時我們可能先具備正確的智慧，然後在真正意義上實踐正確的生活方式，並開始深刻體會瞑想中的禪味醍醐。如此看來，三學並非三種孤立的實踐方法或階段，它們之間具備相應的協調性，因此在實際的功用層面，同樣具備三者相輔相成、雙向循環的可能性。

（二）**宗學** (Study of Buddhist Patriarch's Way)

所謂宗學，是在日本，沿循其獨特的「宗派佛教」的傳統得以形成和發展的佛教研究方法。宗學研究，是在與其他門派界限分明的宗派內部，從信仰的立場出發，為了維繫和提昇開山宗祖及歷代祖師的崇高地位，主要從考證學角度細緻探討和分析祖師的傳記，並揭示或闡釋其思想內涵的研究。

作為日本宗學的形成和發展的背景，其一就是「祖師」被置於「佛」、「菩薩」之前的定位方式。雖然在中國和韓國的佛教當中，也有類似禪宗將祖師與佛平等相待的做法而有「佛、祖」一說，但是即使時至「五家七宗」，也從未出現這麼多專門以祖師作為研究對象的成果。這樣看來，宗學是極具日本特色的佛教研究形式。

（三）**佛教學** (Study of Buddhist Thought and Culture)

這也就是當今通常意義上的「佛教學」，在中國也稱為「佛學」。

作為人文科學的專門領域，「佛教學」是以科學方法為基礎的研究，與研究人員個人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場無關，必須通過對研究對象客觀性的研究、調查和分析，展開綜合評述，有邏輯地闡釋研究的成果。

縱觀佛教的悠久歷史，它完全適合「綜合性文化體系」之稱。對於佛教的研究，根據研究的立場和方法，大致可以分為以上的三種型態。若詳細追究，則更為多種多樣，互相之間也更為交錯繁複。但是，無論何種研究型態，其基礎一定是以文獻批判為根本的文獻學（Philology）方法。畢竟，近代的佛教研究乃至人文科學研究方法，在整體上，其大前提就是嚴密的文本整理和文獻解讀。沒有文獻學方法作為中流砥柱的支撐，人文科學的研究將喪失其立足的基石，這一點我們要時時刻刻銘記在心。

（四）三種方法之間的關聯

至此，我們已經對「佛道學」、「宗學」和「佛教學」這三種佛教研究的方法有所瞭解，也清楚了解其各自的特徵與獨特性。那麼，它們之間是否水火不容或者黑白分明，乃至沒有任何內在關聯呢？事實上，正因為三者各具特色，因此也恰好可以截長補短。例如，第三的佛教學雖然科學態度明確，但是從事研究的主體必然有其主觀態度，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素。這樣一來，就和第一的「佛道學」之間自然產生交集。研究主體在佛道實踐中的切身體驗，會促使其人在思想研究當中展開更為深入的洞察。其次，當有必要拓展細緻入微的調查、討論時，往往第二的「宗學」研究成果最為值得借鑒。這樣看來，無論從「佛道學」、「宗學」和「佛教學」當中的哪一種立場出發，必然和其他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關聯或借鑒，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，這是不待贅言的事實。

三、 佛教研究的現狀

首先，我們先來看近年來佛教研究中，對佛教文本的重新評估。過去，對於佛典或者祖師著作，我們曾經認為此等聖典具有絕對的權威，無人膽敢輕易改動其中隻言片語。然而事實上，經典、論書的文本，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持續地經歷修訂與擴充，同時還有大量的精簡摘抄本不斷問世。時至今日，佛教研究者需要重新評估研究對象的文本，至少在前提上不能將眼前的文本視為該典籍唯一的型態；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，即使聖典，其文本仍極有可能隨時代變化而不斷演變，將這一認知納入視野，再去面對和處理各種文獻，將會非常的重要。

其次，是近代佛典文本的新發見和陸續公開，帶給佛教研究的衝擊和變化。眾所周知，20 世紀初葉，從絲綢之路上的綠洲敦煌出土了大量的寫本，其後又先後在中亞內陸發現了內容豐富的佛教文獻。其中包括在阿富汗巴米揚的佛教遺址中發現後，流傳到挪威的斯奎因收集品（the Schøyen Collection）。另外，近年來對日本各地寺院收藏的寫本大藏經的調查也在迅速鋪展，奈良平安時代的古寫經的重要性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格外矚目。

其三，「大藏經」類的重編與刊行在這樣的形勢下，以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為代表的刊本大藏經在佛教研究中舉足輕重的地位開始受到挑戰。大勢所趨，如今，對於刊本的單方面依賴開始逐漸轉向對寫本的重視，無論刊本抑或寫本，若覺察異本存在之際，儘量全面參照已經成為一種趨勢。此動向並非杞人憂天，畢竟，文本之間的差異有時一字千金，攸關整體的詮釋和理解。

與此相關的則是近幾十年來，在東亞各國、各地開展的「大藏經」

的影印刊行，其中網羅了各種宋代以後的中日韓等國的佛典叢書。其貢獻在於，佛教研究者們將更為容易接近同一文獻的各類文本，通過比較獲知彼此異同所在，對於該文獻自身的漫長歷史演變的過程一覽無餘。

最後，伴隨電腦的發明和普及，各種佛教文本、參考資料等相繼數位化，也為佛典研究乃至佛教研究整體提供了現代化的研究工具。現今，我們已經能夠在電腦畫面上進行對各類經典文本的基本比對和探討。同時，我們也充滿困惑，那就是研究工具的便利性日新月異，而訊息量也隨之水漲船高，究竟如何駕馭這些龐大無比的工具成為奢侈的煩惱。今後，如何培養研究和思考的能力，敏銳洞察各種訊息交錯下的真正問題，有效地擇取和分析，並進一步揭示真相，才是我們面臨的真正考驗。

四、今後佛教研究的要求及方向

(一)研究的進化

筆者認為，今後佛教研究的大方向和目的主要有兩個方面：第一是推動學術研究本身的進程，追求研究的精密和深入程度；第二就是將佛教的智慧滲透到現實社會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。

第一，推動佛教研究的深化，首先要明確意識到，優良的佛典是人類知識文化的重要遺產，我們必須努力予其公正的理解。例如，談及鳩摩羅什漢譯經典之際，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其成立時期，該漢譯本和原典以及其他譯本相比差異何在等問題的探討。事實上，羅什的漢譯佛典多屬文學性的名譯，甚至可以被看作一種「佛經新作」，其中蘊含了他獨特的哲學思想，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從上述的文獻研究中，得出明確的結論。

與此相關的，則是東亞佛教文獻的分類問題。筆者認為，東亞佛教的文獻在整體上，可以分為創作、翻譯、解釋和教化這四大分類。其中，極為特殊的就是最後的「教化」類文獻。此類文獻，是針對立場、知識和教養程度不同的說法對象「方便說法」時的相關記錄。雖然純粹歸屬於此種分類的文獻為數稀少，但是此類文獻所反映的並非撰述者自身的思想，因此增加了理解的難度，處理此類文獻時要非常慎重。

最後，對於文獻的正確解讀，其基礎在於敏銳的語感。今後的研究人才，除了古典文獻的解讀能力，還需要具備足夠推動國際學術交流的現代語學能力，以及跨領域和學科合作之際的廣泛學識素養。

(二)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

佛教的教誨當中，包含了眾多有益於現代社會，對於解決當前的迫切社會問題富於啟示的智慧。將這些充滿智慧的教誨和傳播滲透到普通社會的努力，是佛教學者作為人類社會的中堅力量應該發揮的重要功能。所謂「傳播滲透」的方式，在當代社會已經不僅限於單純的以語言為媒介的傳播。必要時刻，甚至需要身體力行的宗教實踐與弘揚。而隨順機緣投入宗教實踐的抉擇，必將深化我們對佛教的理解和研究，兩者之間必然是相輔相成的。

作為與教育問題相關的環節，在教育體系中推廣「信」、「智」的德育教育勢在必行。尤其是在日本，因為實施嚴格的政教分離的原則，宗教教育備受忽視，隨之衍生的問題不在少數。筆者衷心希望，今後日本能夠培養出更多內心充滿「感恩」、「惜緣」和「託福」概念的青少年。

最後，作為建議，筆者想強調「共成」理念的分享以及相關的具體實踐活動。「共成」是筆者十幾年前開始弘揚的理念，其內涵是「認識

到自身的存在無非緣起而成，從此自覺出發進一步正確認識現實社會，與他人同心協力，致力於和諧安定社會的實現」。

筆者認為，至今為止的佛教研究，在社會的結構、功能和權利等方面，未能給予充分的考察和驗證，也沒有點明其問題所在，更沒有明確地提出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案。憑藉佛教自身的慈悲與智慧，如此的無能為力是令人萬分遺憾的事實。但是，正因為我們已經深刻的意識到問題的存在，我們可以從當下出發，開創新的佛教歷史進程，為解決當今和未來社會的病痛，注入一劑清新的良藥。